

如·玉·人·生

——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华诞文集

于明主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如玉人生

——北京韩美仑先生书画作品集

王 明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如玉人生

——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华诞文集

于 明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为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华诞而集结的文集。共收录国内外论文及杨先生朋友庆祝文章六十余篇。内容包括有关玉学玉文化方面的论文、杨伯达思想研究文章及回忆杨伯达先生往昔生活的文章。本书概括了中国玉学玉文化的进程,展现了杨伯达先生数十年的学人生涯,对于玉文化的重要观点、历史进程及现状都做了深入研究。

本书可供文博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及玉文化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玉人生: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华诞文集 / 于明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03-018191-3

I. 如… II. 于… III. 杨伯达—纪念文集 IV. 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8574 号

责任编辑: 闫向东 李 茜

责任印制: 安春生 / 封面设计: 高海英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 × 1194 1/16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32 3/4 插页: 1

印数: 1—1 600 字数: 821 000

定价: 1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如玉人生

玉，生长于巍巍昆仑之巅，游走于蜿蜒白玉河谷，蕴山川之美，凝日月之辉，集天地之灵。质，坚缜细腻、温润而泽；性，硬韧有度、凉热适中；色，白绿黄黑、五彩斑斓；音，悠扬悦耳、清越绵长。

玉集人世间美好品德于一身，自古就被赋予“五德”、“九德”甚至“十一德”。

历代先圣先哲、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无不称颂玉之美、玉之德。

“君子比德于玉”，杨伯达先生乃现代君子，风度如玉，品德如玉，人生如玉。

风度如玉。先生高大健硕，长发飘逸，面容俊朗，无论年轻时还是现在，都无疑是一位玉树临风的美男子！

品德如玉。先生仁厚，善待同好，提携后学，从不咄咄逼人；先生质朴，表里如一，心胸坦荡，从不花言巧语；先生睿智，温文尔雅，学富五车，从不恃才自傲；先生勇武，正义凛然，坚忍不拔，从不丧失原则；先生高洁，超凡脱俗，真实自然，从不矫揉造作。虚怀若谷、胸襟博大、海纳百川、勤勉耕耘、安贫乐道，终成学界泰斗的先生不愧为一位玉洁冰清的真君子！

人生如玉。先生一路走来，坦荡而又坚韧，充实而又成功。年轻时追逐真理，向往解放，走向胜利；中年时历经磨练，坚贞不屈，负重前行；晚年时弘扬玉学，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恰似玉材历尽千万年自然洗礼依旧光彩夺目，更如玉器经过多道工序的雕琢和磨砺愈发美轮美奂。先生的人生，犹如一块无瑕的白玉，经过岁月的琢磨历练，最终成为一件罕见的连城美玉！

人生如玉，最高嘉奖，如玉人生，夫复何求！

于 明

2006年12月3日

杨伯达先生简历

杨伯达,祖籍山东蓬莱,1927 年生于旅顺。1948 年华北大学美术系毕业。中国著名文物专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逾五十载,曾任该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艺术史、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和艺术文物的鉴定。七十年代以来,逐步将研究重点转移至古代玉器、玉文化玉学方面,并取得了重大突破,提出了新的论点,成为当今中国玉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曾出访交流、讲学遍及四大洲,包括前苏联、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新加坡等国。

1927 年	生于旅顺
1945 年 3 月	旅顺高等公学校毕业
1946 年 6 月	参加冀鲁豫边区泰西县宣传队工作,后担任泰西县简师夏张高小教员
1946 年 12 月	保送山东大学
1947 年	转往华北大学攻读文艺系
1948 年	华北大学美术系毕业,并任华北大学美术工作队队员
1949 年 ~ 1950 年 5 月	任华北大学美术科助理员、干事,后任北平艺专辅导科干事
1950 年 5 月 ~ 1956 年 4 月	任中央美术学院辅导课(科)干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美院总支副书记、代主任、展览工作室副主任
1956 年 4 月 ~ 1965 年 5 月	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美术史部副主任
1965 年 5 月 ~ 1972 年 8 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转往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任学员、大队长、校部生产指导组组长、党委委员
1972 年 8 月 ~ 1976 年	任故宫博物院业务部副主任、陈列部主任
1976 年 ~ 1987 年	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
1987 年 9 月起历任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研究员 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会长 中国防卫科技学院顾问教授 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鉴定硕士研究生导师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荣誉顾问 香港徐氏艺术馆顾问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中华文物馆客卿顾问 新加坡收藏家学会海外高级顾问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会员 中国宝石协会顾问等

主编大型图册、论文集

- | | |
|----------------------|------------------|
| 《中国美术全集·玉器》 | 1986年,文物出版社 |
| 《中国美术全集·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 | 1987年,文物出版社 |
| 《中国美术全集·元明清雕塑》 | 198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 |
| 《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工艺美术》 | 199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 《中国玉器全集》(6册) | 1993年,河北美术出版社 |
| 《中国玉器全集·隋唐—明》 | 1993年,河北美术出版社 |
| 《华夏玉器——鉴赏篇》(12册) | 1996年,美国中华艺文基金会 |
| 《华夏玉器——鉴赏篇·9·隋唐—宋》 | 1996年,美国中华艺文基金会 |
| 《华夏玉器——鉴赏篇·10·辽—明》 | 1996年,美国中华艺文基金会 |
| 《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 | 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 |
| 《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 | 2001年,紫禁城出版社 |
| 《中国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全集》(6册) | 2002年,河北美术出版社 |
|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 | 2002年,紫禁城出版社 |
|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 | 2003年,紫禁城出版社 |
| 《中国和田玉玉文化研究文萃》 | 200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
|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 | 2005年,紫禁城出版社 |
| 《玉缘》 | 2005年,文物出版社 |
|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 | 待出版 |
| 《昆仑之魂》 | 待出版 |

专 著

- | | |
|-------------------|--------------------|
| 《故宫博物院》(与翁万戈合著) | 1978年(并翻译为英、德、意文版) |
| 《埋もれた中国石佛の研究》 | 1985年,东京美术 |
| 《清代广东贡品》 | 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
| 《古玉考》 | 1992年,香港徐氏艺术基金会 |
| 《中国工艺美术史》(与田自秉合著) | 1992年,台湾文津出版社 |
| 《清代古代院画》 | 1993年,紫禁城出版社 |
| 《珍玩雕刻·鼻烟壶》 | 1993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
| 《关氏所藏中国玉器》 | 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
| 《清代官窑瓷器》 | 1994年,香港徐氏艺术基金会 |
| 《古玉史论》 | 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 |
| 《传世古玉辨伪研究》 | 2003年,香港三余堂有限公司 |
| 《中国古代艺术文物论丛》 | 2003年,紫禁城出版社 |
| 《巫玉之光》 | 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
| 《古玉鉴定之隋唐至明清》 | 2006年,广东教育出版社 |

目 录

如玉人生
杨伯达简介

从史前玉文化研究成果看中国史前史——为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诞辰而作	郭大顺(1)
凌家滩玉器文化研究	张敬国(13)
红山文化玉器造型艺术分析	席永杰 张国强(23)
良渚文化玉耘田器的再认识	刘 斌(36)
良渚文化玉锥形器为“终葵”考	周晓晶(43)
史前时期岫玉之路试析	刘俊勇 刘 婉(59)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器中的几种线条装饰	张广文(69)
西辽河流域史前玉器概论	刘国祥 王 苹(76)
金沙玉器的发现与发掘	王 方(86)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之探析	孙传波(100)
旅顺博物馆藏传世猪龙形玉块辨析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郭富纯(105)
战国、秦汉带铭玉器初步研究	翁雪花(110)
汉玉辨伪二题	李银德(126)
花园庄 54 号墓出土部分玉器略论	徐广德 何毓灵 陈启贤(132)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玉礼仪器浅析	彭明瀚(146)
从命树论摇钱树之内涵与源起	俞美霞(154)
玉俎偶初识	张明华(170)
和田玉入中原之早期路线考	沈 蹇(182)
中国玉器的历史性贡献——一论“玉器时代”	于 明(185)
汉玉所见两汉辟邪厌胜思想研究	徐 琳(192)
平朔汉墓出土玉器述要	马金花(204)
从江西出土的组玉佩论及明代的组玉佩形制	陈建平(214)
滇国玉器研究	赵 美(222)
辽代佛教用玉器研究	云希正 袁 伟(231)
我研究“痕都斯坦玉器”的心路历程	邓淑苹(244)
大连巨长石矛的发现与研究——兼及大玉戈和兵礼器	王嗣洲(262)
历代制玉工艺演进和分析	赵永魁(268)
谈谈玉料方面的几个问题	王时麒 员雪梅 赵朝洪(282)
中国玉器之美	常素霞(289)
玉的道德蕴涵及其形成机理研究	周佩玲 杨忠耀(294)
玉文化与玉雕艺术	陈曙明(302)
关于中国古代玉璧若干问题的认识	殷志强(317)

浅析和田玉的历史地位及多元价值	陈华祖(327)
中国古代玉文化概述	古 方(333)
民族玉器综论	于宝东(342)
他推动着中国玉文化学科走向未来——祝贺玉学大师杨伯达先生八十寿辰	张宏明(352)
试论杨伯达先生玉文化和玉学观	栾秉璈(366)
新疆且末玉的氩同位素定年研究	周述蓉 罗清华 贺云翱 饭塚义之 那汝瑜 唐贵琳(377)
浅谈戈壁玉	倪伟斌(383)
中国古代玉器的宏观鉴定论	周郁成(386)
颂玉——从人养玉 玉养人谈起	李新科(411)
君子如玉 达济天下	徐湖平(415)
虔诚的追寻——回忆一段难忘的岁月	闻立鹏(417)
六十年后话同窗	于阜民(425)
在转移中的杨伯达同学	李 健(431)
在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日子	谭云森(436)
贺杨伯达先生耄耋之寿——忆往昔几事	李久芳(441)
我们的“少帅”——杨伯达	李辉柄(444)
玉之风范——杨伯达先生印象谈	宋玲平(445)
忆故宫博物院《铭刻馆》	叶其峰(447)
毕生耕耘 硕果累累——记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研究员杨伯达先生	张 荣(452)
玉界泰斗 藏家挚友——记文博大家杨伯达先生	杨才玉(455)
杨伯达先生与《岭南藏玉》	单小英(459)
中国玉文化与人文奥运——以红山玉文化诠释奥运会会徽	朱成杰(464)
智者善玉,成就国宝	吴 南(474)
杨伯达先生考察赤峰——为八十华诞	乌 兰(476)
论玉德——谨以此文献给杨伯达先生八十大寿纪念	曾卫胜(479)
由表及里 高屋建瓴——杨伯达先生玉文化玉学研究成果评介	崔岩勤(492)
我与杨伯达	邢开仁(499)
我眼中的杨老	李苏丹(501)
从杨伯达先生的“三个没想到”说起	江富建(502)
古稀老人授课严谨 鉴定玉器治学有方——记杨伯达在西北大学讲课点滴	惠 明(508)
我印象中的玉学泰斗杨伯达先生	陈利娟(512)

从史前玉文化研究成果看中国史前史

——为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诞辰而作

郭大顺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进展明显加快，其直接后果，就是推动了以文明起源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史前史的研究，并随着条件的成熟，考古界于 90 年代初率先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号召^[1]。这一时段，也正是史前玉器由大量发现到研究成果快速积累的时期，在杨伯达等先生的倡导、组织和引领下，史前时期的玉器研究与史前考古研究紧密结合，进展迅速而有序，逐渐成为中国史前史研究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在中国史前史的重建中正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史前玉器研究对中国史前史研究的推动，是从多个方面展开的。本文试从史前玉器的分区研究、史前玉器在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及相互交流中的作用、史前玉器研究与文明起源研究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史前玉器的分区及对史前文化多元性的新认识

80 年代初红山文化玉器的鉴定结果被公布以后，它的总体风格，无论是以动物形玉、勾云形器、斜口筒形器以及方圆形玉璧为主体的造型，还是手法多样而显粗犷的纹饰，都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这与当时刚确定的另一群史前玉器，即东南沿海地区以讲究造型规整、纹饰细密的以琮、璧、钺为主体的良渚文化玉器群相比较，其间的差异泾渭分明，遂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是，史前玉器的分区，很快成为前沿课题。黄宣佩先生初将中国史前玉器分为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主和以良渚文化玉器为主的北、南两大区^[2]，邓淑苹先生则进一步分为华西、华东的北部、华东的南部至华中的三大区，并同《尚书·顾命》所记古代玉料主要产地的大玉、夷玉与越玉相比附，提出史前玉器三元论^[3]。此后史前玉器分区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关系密切的重要研究成果有，杨建芳先生直接倡导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玉器，特别是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玉器研究，为此，他较早提出玉器“板块”的分区概念，在将史前玉器分为六个板块的同时，提出不仅玉器分区，而且每一个玉器“板块”甚至每一种玉器，都可以从区系类型角度进行分析^[4]。黄翠梅教授受苏秉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三模式，即原生型、次生型与续生型的启发，将史前玉器分为“原生型的主系统”和“次生型的亚系统”，前者初包括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北系统、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系统以及以陇东为中心的西北系统三大区，后将西北系统列入“次生型的亚系统”；后者包括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系统、以两湖为中心的华中系统、以巢湖为中心的江淮系统以及以陕北晋南为中心的北方系统^[5]。

在史前玉器分区研究方面，杨伯达先生作过较多较全面的论述。他在参考考古学文化区

系类型理论和总结以上史前玉器分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世纪之交,先后发表《珣玕琪考》和《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论》等文章,提出史前中后期东夷、淮夷、东越三大玉板块和晚期海岱、陶寺、石峁、齐家、石家河五个玉文化亚板块的划分。他将史前玉器出土情况、不同区域玉材的矿物学比较与文献记载的玉石产地相对应,认为文献所记东北地区的玉料“珣玕琪”和东南地区的玉料“瑶琨”,与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北、南两系玉文化是相吻合的,而出现较晚的西部玉文化则相当于文献记载中西北地区的玉料“球琳”,从而也突出了东北、东南与西部这史前时期以来的三大玉板块和玉品种^[6]。

以上可见,史前玉器的分区研究,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等研究成果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方面表现为前者接受后者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玉器分区研究的独立性及其与考古学文化分区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其中对史前史研究最有参考价值的,是史前玉器三大板块即东北区、东南区、西北区与考古学文化三大区的划分及其对应关系。

有关考古学文化三大区的划分,首见于苏秉琦先生。苏秉琦作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开创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将中国人口密集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考古文化区系的基础上,曾提出过三大经济文化区和面向海洋与面向欧亚大陆两大块的划分^[7]。90年代初随着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进展,他又提出从文化传统、民族融合、影响社会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方面考察,发展的重心常在北部三大区,即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和以燕山南北为重心的北方^[8]。在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和他的一些具体观点启发下,渐有学者以经济类型和考古文化特征为标准,提倡包括东北区在内的三大考古文化区的概念^[9],即以彩陶、尖底瓶、鬲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中原文化区,以鼎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以饰压印纹的筒形陶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文化区^[10]。

以上考古文化三大文化区的划分,与史前玉器的三大板块基本上是吻合的,但又有相互补充之处。

首先是对东北文化区的理解。主要是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辽西区是否属于东北文化区,这是认识东北文化区的一个关键。由于一般倾向于红山文化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或将辽西区划归入与黄河流域有关的“燕辽文化区”,这说明关于辽西区是否属于东北文化区,仍是一个有不同理解有必要再讨论的问题。

我在论述东北文化区的有关文章中曾论证,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辽西区,应属于东北文化区。理由是:辽西区从先红山文化时期的查海—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及大约同时期的赵宝沟文化等,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东北文化区的基本特征,如以饰压印纹的夹砂筒形陶罐作为一个标准,除先红山文化以这种筒形罐为主以外,红山文化时期饰压印纹砂质灰褐陶筒形罐仍然是该文化的主要内涵,与之共存的泥质红陶和彩陶则是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吸收;夏家店下层文化虽已具有更多龙山时代和夏商文化的特征并已拥有发达的锄耕农业,但该文化仍强烈地表现着东北文化的区域性特色,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筒形鬲已有源于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筒形罐的可信线索^[11]。

对赤峰地区史前到青铜时代的环境考古学以及经济生活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赤峰地区在距今8000~4000年前属于暖温性夏绿阔叶林区,到距今3000年左右才逐步演替为森林草原区直到现今的典型草原景观,孢粉、兽骨和植物标本分析证明,在这一自然生态下成长起来的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和红山文化,都以采集和渔猎业为主要经济活动,栽培作物虽也发生甚早,但在实际生活中所占比例甚小,直到早期青铜时代的夏家店

下层文化时，农业才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游牧文化的进入以及农牧并举或交错，也是青铜时代以后的事。说明从先红山文化到红山文化时期，辽西区的自然生态和经济生活与广大东北区是一致的^[12]。

这样，从考古文化特征、经济生活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看，史前时期的辽西区是东北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广阔的东北大地可以视为辽西区诸史前文化发达的背景。同时，辽西区又是东北文化区与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接触的前沿地带，由于长期吸收邻区先进文化因素，辽西区在东北区中文化水平率先发达，文化面貌起了较大变化，但其本质仍是东北文化区的特点。

史前玉器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在辽西是否属于东北区以及东北文化区的最后确立问题上，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东北地区的史前文化虽然考古工作做得较少，大多数遗址只做过调查，经发掘的遗址甚少，所知史前遗址分布较稀，文化堆积较薄。但在近 20 多年来，在史前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却经常有玉器发现，玉器的形制虽简单，大都为缺乏纹饰且造型简单的环、璧一类，却很具地区的普遍性，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是玉玦（又称“耳玦饰”或“珥”），这种在中国玉器中起源最早同时又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玉类，现知最早形制就发现于东北地区，有学者以为，东北地区很可能就是玉玦饰的起源地；一是东北地区史前玉器中的玉璧，大都额外耗费工时地做成外缘近方、内缘圆、内外边薄似刃、璧面中凸的形状（杨伯达先生称为“玉圆形边刃佩”），以至成为东北地区史前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类。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的这些特点，也都见于辽西区，尤其将东北地区作为早期玉器实例发现最多从而玉器发达最早的“原生区”，也是以辽西区距今 8000 年前的查海、兴隆洼遗址和距今 5000 年前的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器为主要依据的。我曾以东北及东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及其背景，从经济类型、石玉分化等方面，论证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有关，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辽西区与东北文化区的统一性^[13]。日本学者秋山进午还认为，红山文化玉器以动物形玉为主要内容，其原型又大都是野生动物如熊、野猪、鹰等，就与东北文化区的渔猎经济有着直接关系^[14]。这样看来，红山文化玉器的独特风格，还主要是以东北文化区的区域特点为背景形成的。

不过，史前玉器分区与考古文化分区也有相悖之处，就东北区的划分来说，有的学者主张将山东半岛史前玉器与东北玉器划归为一区，称“夷玉”区，就很值得商榷。尽管学界多有据史书《东夷传》将中国东部与东北南部都列为夷族活动区域，但从考古文化特征看，那是青铜时代以后的事，在史前时期，山东半岛基本不见东北文化区的筒形陶罐，而是陶鼎的主要起源地，“鼎文化圈”除了山东半岛，还包括东南沿海区和江汉平原等南方区。就玉器来说，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玉器，较有特色的是牙璧和牙璋，牙璋完全不见于东北区，而牙璧只在辽东半岛有所发现，那是两个半岛间频繁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至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与辽西红山文化之间，共同点甚少，就玉器来说，其间的关系，是红山文化玉器对山东半岛的影响，如野店墓地所出双联玉璧和四联玉璧，但那在海岱区史前玉器中，只占很少的分量^[15]。

由于山东半岛不属于东北区，却与东南沿海区以至南方江汉区关系密切，故在划分大区时，将东部和南部这三区视为一个大区，这除了考虑稻作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和以鼎或鼎豆壶的组合为主的考古文化特征在这三区具共同性以外，玉器所表现出的共同特点，当然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证据。海岱区史前玉器已如上述，较有特色的牙璧和牙璋，从时代看，牙璧最早出现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大量出现是龙山文化时期，牙璋则最早不超过大汶口文化末期到龙山文化初期，可见它们或时代不早，或原型非原创，其他玉器也主要接受东南沿海史前文化主要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影响或具有更多共同性，所以仍被列为与东南区有关的“次生型亚

区”。东南区史前玉器再一个较有自身特征的就是安徽含山凌家滩。这里所见的玉人、龙、虎、龟壳、熊鹰合体饰件等，尚不见或少见于他处，故有独立成区之依据。但严文明先生已指出，这类形制甚为进步的器类，均为上层人物专用的特殊器物，一般的玉器种类仍为玦、璜、璧和管珠等，这一玉器组合为长江中下游大约同一时期诸文化，如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所常见，应视为东南沿海至南方的江汉平原等地区史前玉器的共同特征，故又被划为“以巢湖为中心的江淮系统”的次生型亚区^[16]。此后在这一广大地域内，玉器的地区分化仍在继续，如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出现有人、虎首饰、玉鹰等自身特点，但多数器类仍受到东部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所以何介钧先生就提出，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始终笼罩在良渚文化强烈的氛围之中，自始至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7]。故无论是经济形态与以陶器为主的考古文化特征，还是玉器，将山东、环太湖及江汉平原划为一个与东北文化并立的大区，是可信的。

最后谈到中原区。这是史前文化发达较早、发达时间延续较长也较为稳定的一个地区。以粟作农业为主、以彩陶和小口尖底瓶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的仰韶文化作为中原区的代表性文化，与东北与东南两大区在经济形态和以陶器为代表的考古文化特征上差别明显。玉器差异的表现方式则有所不同，当东北区的红山文化和东南区的良渚文化等史前玉器最发达的时期，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只有少量工具类或小件装饰品类的玉器，很难形成区域特征。有学者倡导“华西区”或“以陇东为中心的西北系统”和“以陕北晋南为中心的北方系统”，那是以发达较晚的齐家文化玉器和陕北晋南龙山文化时期玉器为依据的。而齐家文化玉器中的主要器类是玉璧，还见有玉琮，陕北除玉琮外，还多见玉璋，它们的形制明显是受到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产生的，玉器的自身区域特点仍然不够明显，所以也被列为“次生型亚区”。近年在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和山西南部清凉寺龙山文化早期墓地，陆续有较多玉器发现，不过多为玉斧或玉钺等工具或武器类及其演化形态，清凉寺墓地的琮、璧和牙璧也都是在东部影响下的产物^[18]。这样，在以玉器为标准所划分的东北、东南和中原及西北三大区中，中原和西北是以发达较晚且一直笼罩在东部影响之下的玉文化，而与东北、东南两个史前玉器发达区相并立的。

古史研究家曾依文献记载将传说时代的人群，分为中原区的华夏、东方的东夷和江汉平原的苗蛮等三大集团^[19]，如以上述考古文化和史前玉器所划分的三大区为基准，与古史传说这三大集团相比较，可作如下校正：东北地区应单独作为一个集团；山东与东南、江汉地区即东夷和苗蛮，可视为一个大的集团，这样仍可作三大集团的划分，即以仰韶文化为主要代表以粟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中原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以东方和东南沿海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同以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为代表、以江汉平原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东南和南方集团，它们大都属稻作农业区；以红山文化为主要代表、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集团。这就是从史前玉器与考古学文化分区的对应关系，所揭示的中国史前时期人群活动及他们所创造的考古文化分布范围的基本格局。

二、史前玉器在考古学文化及其关系中的地位

多年来，考古学文化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是认识到组成考古文化的众多因素中，它们的活跃程度及其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次、有大有小的。史前玉器的研究、主要是对玉器属性的新认识，加深了对考古文化中诸因素这种不平衡属性和作用的认

识。因为玉器作为一种表达思维观念的非实用器，其文化含量要大于包括陶器在内的与生产、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文化要素。在某些考古文化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玉器还是诸因素中发达水平最高的一类。

由此，玉器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考古学文化及其关系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些深层次规律，也由于玉器的加入而不断被揭示出来。由此可以从玉器在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从史前玉器交流所见史前文化交流趋势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还是从史前玉器的两个“原生区”说起。

从目前发现资料看，东北史前玉器形成较早，在距今 8000 年前的查海—兴隆洼文化时期已有玉耳玦饰和玉匕形器的固定组合，其分布范围遍及东北，向南越过燕山，在华北平原北部太行山东麓与查海、兴隆洼遗址大约同时的河北省涿水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北福地遗址，有同样的玉器组合发现^[20]。当然，东北地区玉器的原生性特性，最集中的还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出现，这是东北史前玉器发展过程中的最高峰，但从牛河梁遗址积石冢的分期结果可见，这一高峰期只见于红山文化晚期和晚期的最后一段。

东南区目前发现的史前玉器时间较东北区为晚。距今在 7000 年以内的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现有玦、璜、管珠等，虽都为石质，仍可视作早期玉器的一类。但东南区很快就形成不同于东北区的自身区域特征，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时期除玉玦继续发展以外，玉璜与玉管珠类等颈饰品已趋定型，且出现了凌家滩遗址那样的高峰期。不过，东南区玉器发展的最高峰是良渚文化，时间跨越该文化的早期到晚期，发达的时间较东北区为长，分布密度远较东北区为大。

这里要提出的是，这两大史前玉器“原生区”在玉器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突变”。这指的是东北区的红山文化玉器和东南区的良渚文化玉器的出现，时间在距今 5000 年前后。红山文化玉器中，已不见或极少见查海—兴隆洼文化多见的玉玦和玉玦与匕形器的组合，却创造了大量新玉种，数量也大为增多，个体变大，特别是造型极为抽象且已相当成熟的龙、凤等玉类已出现。良渚文化玉器虽然源自当地的序列及自身的演变较东北区为清晰，但良渚文化时期玉料使用量的大量增加，使用以细密如毫发的纹饰为代表的制玉工艺，琮、璧、钺为组合的新器类替代玦、璜、管珠等耳、颈饰品占据了主导地位，仍都给人以突然的感觉。这一突变十分重要：它使玉器作为这两支考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因素，在社会文化总体发展水平上超越同时期相邻诸文化，也使这两支考古文化的“个性化”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从而最终形成北、南两大区各自的区域特色，并从工艺、造型、纹饰等方面，为后世玉器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杨伯达先生视巫玉阶段为“玉文化的第一座高峰”，“不然，我们的祖先就不可能从野蛮走向文明”。而这一阶段的最终完成，也与这一突变有着直接关系^[21]。

关于考古学文化及考古文化区域的“个性化”，通常是以陶器作为主要标准的，那是因为陶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或与之有关的礼器，其特征及变化较其他文化因素敏感。但随着史前玉器发现和研究的进展，特别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的玉器，它们在表达各自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区域特色方面，所表现出的活跃程度和敏感程度又远远超过陶器。

玉器在考古文化诸因素中的这种敏感性和活跃性，尤其在史前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有更为突出的表现。

关于史前时期各大区之间玉器的交流，学界早已留意，多从传播角度分析。杨伯达先生则提出板块间碰撞、融合、挤压等交流的多样形式^[22]。这里仅举史前玉器在交流中表现显著

的实例。

早期的传播,可举玉耳玦饰为例。依目前发现,其最早出现于东北地区,且与另一种形制特殊的匕形器为固定组合,由辽西而东北,甚至扩展到广袤的东北亚地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滨海洲的 Chertovy Vorota 洞穴遗址(距今 6500 年左右)和滨海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分别有玉玦和玉匕形器出土;在日本列岛,有北海道共荣 B 遗址出土的属于绳纹时代早期的玉耳玦饰,尤其是日本海沿岸的福井县桑野遗址(距今 6000 ~ 7000 年前,属绳纹时代早期)也发现了玉玦与玉匕形器共出的实例^[23]。玉玦向南,先遍及东南(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北阴阳营遗址)和长江中上游(大溪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达中原和南方广大地区,且出土数量增多,阶段连续性强,延续时间长,甚至在中国西南、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也有玉玦发现。一般以为,这是以东北地区玉器向南传播为起始点的^[24]。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玉玦向东北方向的传播,虽从辽西遍及东北亚广大地区,却都是以筒形陶罐和渔猎经济为共同区域特征的,可以视为同一大区内的传播。而玉耳玦饰所达的东南、南方和更南的地区,则是与东北区完全不同的考古文化和经济类型,如是由北向南的传播趋势,那么,其传播力如此之强,不能不对“玦”这种形制似简而含义颇深的耳饰玉类的社会功能、制作工艺,它于观念形态上所具有的跨区域跨文化的特性,从而在中国以至东方早期历史文化发展趋同性上的作用,予以格外重视。“玦文化圈”是对史前时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准确概括^[25]。邓聪先生更把这一“玦文化圈”现象与汉字文化圈相比较,以提醒学界重视它在中国古代文化统一性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26]。

不过,史前玉器这种大范围的交流和传播,以距今 5000 年前后,也就是东北区与东南区因突变而产生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时期,表现最为强烈。这时,由于陶器已进入礼器化过程,在文化交流中也活跃起来,表现出玉器与陶器在交流和传播中有同步的一面。如在冀西北阳原县姜家梁遗址有红山文化的玉雕龙与小河沿文化陶器共出的墓葬^[27];更靠南的晋南陶寺遗址墓葬中,既有具红山文化特征的方圆形玉璧,也有受红山文化彩陶龙鳞纹影响的朱绘龙纹陶盘,某些陶器形制如折腹盆则可能与小河沿文化的影响有关^[28]。这种大致同步传播的情况也见于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相互交流过程中,在苏北花厅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墓地中,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也是同步进入的^[29]。陶寺墓地也同时有来自东方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和玉器共出的情况。但这一时期正值东北区和东南区史前玉器发展的高峰期,无论是红山文化玉器,还是良渚文化等东南区史前玉器,它们在文化交流中的活跃程度高于陶器的一面也充分体现出来。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除见于晋南陶寺以外,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甚至石家河文化中都可见到,而这些地方完全不见红山文化陶器的因素^[30]。良渚文化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玉器则向晋南、西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全面传播。其中良渚文化特有的玉琮向西北方向的传播,不仅见于晋南的陶寺和清凉寺墓地,还远达陕北地区延安芦山卯等遗址。向西,在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也已有良渚文化玉琮出现,可见东南区向西和西北方向传播,无论同时还是隔段,都保持着强劲的势头^[31]。杨建芳先生也曾对大溪文化玉器源于长江下游,有领环源自山东大汶口文化,石家河文化玉器所受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陕西、山西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玉器来自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做过详尽分析^[32]。黄翠梅教授还比较各地出土玉琮的差别,提出玉器的传播有“传承”和“变异”的程度差异^[33],表明具体分析玉器传播过程中的多种不同形式,将会对诸考古文化间的组合与重组有更深入的理解。

这里要格外提到海岱区史前玉器。虽被列为“次生型亚区”,但在距今 4000 年前后,海岱区的龙山文化在吸收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工艺和造型的基础上,在切片、镂孔、镶嵌

以及扉牙、细镂花边、减地阳纹等制玉工艺，以牙璋、牙璧、圭和“介”字形帽花边为代表的造型，以神人面、兽面纹为主题花纹和纹饰分层、分主次等方面，都有很多创新，并成为继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之后由东向西传播的主要使者，从而促成了“龙山时代”的最终形成^[34]。

以上史前玉器在文化交汇中所表现出的超过其他文化因素的活跃性和敏感性，使玉器成为反映考古文化及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指示器。由此将史前时期各大区考古文化交汇的一些主要趋势，揭示得更为清晰：从交汇方向看，既是多方向的，又以东北区向南（东南沿海和华北平原）和由东南区向北（苏北与山东）、西（长江中上游）和西北（山西、陕北）地区的影响为主流；交汇的总态势不是以往所谓的由中原向四周的扩散，而是由四周向中原的汇聚，主流是由东北、东南方向中原地区汇聚；交汇的后果，是由距今 5000 年前以个性化得以充分发展并交汇趋于频繁，导致距今 5000 年后最初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即从仰韶时代过渡到龙山时代。

《史记·五帝本纪》：“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这句话极为简练，却将神农氏之后的五帝时代前期诸部落集团间相互接触、碰撞、交流这一时代特点作了非常概括的描述，这同距今 5000 年前后三大区之间考古文化间以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为主导方向的频繁交汇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也使从包括史前玉器在内的考古文化及其传播过程中，追寻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和部落集团的活动，有迹可寻^[35]。对此，杨建芳先生以史前玉器的传播为依据，联系古史传说，对史前部族的迁移多所考证。如他以为，石家河文化玉器有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可能与古史记载的东夷族西迁到江汉平原有关。陕西、山西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玉器来自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则可能就是古史记载尧舜时期“窜三苗于三危”的历史背景。红山文化玉器确立后，邓淑苹先生以红山文化玉器甚高的发展水平及与商代玉器的某些内在联系，重提史学界关于商文化起源于东北地区的观点^[36]。

三、史前玉器研究与文明起源研究

从上述史前玉器的分区及其在考古学文化和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活跃角色，已触摸到史前人群、包括五帝时代代表人物和集团的一些重要活动轨迹和重大事件。然而，由史前玉器所见的中国史前史，成果最为显著的，是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推动。

其实，从 80 年代中期兴起的中国文明起源讨论，就是从史前玉器的研究主要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开始的。80 年代初，红山文化玉器刚一确定，就直指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大课题。当时的主要证据是红山文化玉器的高度抽象化却又在分布区内外的高度规范化和龙形玉器的出现，以为这是思维观念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并已受固定思想观念的制约，它们已非原始氏族社会所能拥有，而是跨入文明时代才有的社会现象，据此，孙守道与笔者提出“辽河流域原始文明”的概念^[37]。稍后，汪遵国依据 70 年代玉琮年代的确定和埋葬大量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连续发现，与《周礼》“璧琮以殓尸”的记载相对照，提出“玉殓葬”，并开始与文明因素相联系^[38]。

以后有关的讨论，以“玉器（兵）时代”的提出和玉器与巫、礼的关系，对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所起作用最大。

多位研究史前玉器的学者，都引述《越绝书》风胡子“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话，认为中国上古史上在石器时代之后和青铜时代之前，应有一个“玉兵（器）时代”，如红山文

化玉器研究者孙守道^[39]。“玉器时代”或“玉兵时代”的提出，虽然只是对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一个补充且是旧话重提，却是随着史前玉器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而提出来的。玉器成了确立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准，而且恰是中国文明的开端时期，这既说明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地位和作用之突出，也是以中国考古实践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这自然也冲破了通常以城市的形成、金属铜的发明和文字的出现这三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的桎梏。特别是，“玉器时代”的提出，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道路和特点。张光直先生先已提出通神及神权的取得，是同人与自然和谐的宇宙观相一致的，是中国和东方不同于西方以改造自然为主的“破裂性文明”的“连续性文明”，后以此观点解释良渚文化玉琮所具有沟通天地的功能时，又将玉器时代称为“玉琮时代”，以为这一由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是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时代^[40]。

与“玉器时代”密切相关的，是关于巫与礼的研究。

积极提倡“玉器时代”的牟永抗、吴汝祚两位，在论证“玉器时代”的特点时，已在思考玉器与巫和礼的相互关系问题^[41]。杨伯达与张光直两位先生则都辨认出“巫在玉中”。张先生解释良渚文化玉琮上的人兽复合像为巫者驾驭兽举行的通天地活动，称“玉琮的形状和花纹是巫师贯通天地的本事和作业的一种清楚的象征”。杨伯达先生持相同观点并做了更为具体有据的分析，他以为，良渚文化的“神徽”纹中的人面，为倒梯形且是浮雕凸起的，应为人戴面具的形状，故其人非神而为巫，是巫骑兽作法事神的表现。同时，他在分析史前玉器中诸多玉人可能具备巫的性质时，称红山文化新发现玉人为“觚”，由此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为巫玉阶段的两个高峰期^[42]。

受以上观点启发，这里着重谈一点从史前玉器看巫与礼的关系。

早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刚刚被确定时，就提出它们已不是一般的装饰品，而是与祭祀有关的礼器。同时，史前玉器又被公认是巫者用以通神的工具，这就从史前玉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提出了巫与礼的关系问题。

由巫到礼，一般以为是为不同发展阶段，甚至是对立的，但也有学者以为，巫与礼，有相通处或关系密切，更有提出由巫到礼是先后演变关系，并引国学家刘师培的名言“礼源于俗”^[43]。如从史前玉器的角度看，可以对后一观点作些理解和补充。

礼始于祭祀。《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就史前时期来说，祭祀是沟通天与地、神与人的活动，沟通要求和谐。中国又以祖先崇拜为主要祭祀内容，按李泽浩先生的说法，祖先崇拜形成“神人同质”、“神人一体”的一个世界的观念，而不是如西方宗教“创世神话”上帝造万物的“两个世界”。被崇拜的祖先神不是分离在外，而在心中。从而后世的礼同时具有“和合”和“入世”的内在自觉的特征，都可追溯到史前时期^[44]。

这是考古学研究触及思想史领域方面的问题，这一问题可能因为玉器的介入而有一些新的理解。因为玉作为自然之物，具有温润中和的特性，既在天地神人之间的沟通上效果最佳，又是和谐观念最适当的载体，于是被选为通神的工具。巫是玉器使用的垄断者，必然又是玉器制作的设计者甚至制作者，于是玉器被赋予了巫的意志和品格，被古人视为“神物”（《越绝书》）。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墓葬盛行只葬玉器，不葬或基本不葬其他与生产、生活有关的陶、石器的“惟玉为葬”习俗，说明红山人对玉的特性及其所具有的通神功能有执着的认识，是史前人崇玉为神物的最好说明^[45]。杨伯达先生对此有系统论述^[46]。王国维先生并释“礼”字最初的创意就是“以玉示神”，这是首次将玉器具有沟通天地神人功能的这种神性或灵性与礼相联系^[47]。

礼又处处要求社会关系的有序。“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祭》）。红山文化和良